

邁向氣的傳通理論：西學與漢學的對話

鍾振昇
何美惠

摘要

「氣」的傳播溝通(傳通)理論剛萌芽不久，是個由中國的老哲學導引出來的理論。本文以氣的哲學為背景，提出氣理論的基本原則和氣傳通的假設各八項，以作為氣的傳通理論基礎。文中指出，陰陽構勢而造成「能」的流通，即成氣。傳通行為可調節陰陽的差距，造成激烈或溫和之氣，促進傳通效果。本文以此新理論為基礎，與相關的三個西方傳通理論——系統理論、共振理論和關係辯證理論——進行對話，並指出氣的傳通理論優於這三項理論之處。

關鍵詞：氣、勢、傳通、傳播、溝通、傳播理論、辯證

鍾振昇，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研究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氣的傳通理論、組織傳通、公司傳通、領導傳通、小組溝通。電郵：jchung@sfsu.edu

何美惠，美國和台灣會計師，美國InterTax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研究興趣包括氣的傳通理論、國際稅法、氣理論對商業循環和財經市場的解釋與預測。電郵：mayhocpa@intertax.com

Toward a *Chi/Q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 East-West Dialogue

Jensen CHUNG

May H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hi* communication” is an emerging theory built on an old Chinese philosophy. It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yin-yang* dualism stemming from principles of *I-Ching* (also spelled as *Yi Jing*), The Book of Chang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theory by putting forward eight basic principles of *chi* theory and making eight corresponding assumptions. To explore what the new theory can contribute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theory with three relevant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Employing Lao Tze’s tenet in *Dao De Jing*, *chi* is defined as perceived vital energy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play between opposite *yin* and *yang* attributes. The *chi*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perceived vitality resulting from interplays between opposites in communication elem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in* and *yang* in messages

Jensen CH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h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May HO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 CPA, U.S. and Taiwan), president of InterTax Inc. in San Francisco. Research interests: *Ch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chi* theory in interpretation and prediction of business cycle and financial market

constitute a *shih*, propensity or a strategic advantage. Communication can facilitate the *shih* by adjus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yin* and *yang* to generate either a drastic *chi* or a mild *chi* depending on the communication purpose. Such an adjustment may boost communication effectivity.

Resting on the *chi* philosophy, eight basic principles of *chi* theory are proposed, each followed by a corresponding communication assumption as follows: (1) Communication *chi* exists in all communication elements, each with *yin* and *yang* attributes. (2) In all communication *chi*, *yin chi* embraces a potential yang element, its own opposite, and *yang chi* may also carry *yin* elements. (3) Alte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yin-yang* differe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chi* may change the direction and speed of flow and may influence the extent of *chi*. (4) *Chi* and *shih* in communication are inter-related. (5) In each element of communication *chi*, the *yin* and *yang* attributes may rotate and swap places cyclically upon reaching the ultimate state. (6) *Yin* and *yang chi* in communication elements can interplay to produce new generations of *chi*. (7) Communication *chi* can be absorbed, transformed, preserved, and dispersed; *chi* is structured to take a shape and is influential when dispersed. (8) Commun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gathering, dispersing, impacting, changing, and integrating *yin chi* and *yang chi* of communication elements.

Unique strengths of the *chi* theory emerge when the theory is compared to three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system theory, resonance theory, and relational-dialectics theory. The strengths include (1) advancing the *yin-yang* complementary approach to reach harmony, instead of seeking balance in the tension of confrontation, as suggested in the relational-dialectics theory; (2) emphasizing the socio-emotional or relational aspect of communication instead of merely stressing the task functions; (3) offering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chi* by nurturing one's ow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sanity; and (4) enhancing message power by employing the “suck,” “duck,” “buck,” and “construct” methods.

Keywords: *chi*, *shih*, *chi* communication theory, dialectics, energy flow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ung, J. & Ho, M. (2012). Toward a *Chi/Q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 East-West Dialogue.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 151–182.

魏武將見匈奴使者，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問諜問：「魏王如何？」，匈奴使答：「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楊勇，2000，頁551)

《世說新語》裏的這則故事，隱含一個東方獨特的傳播溝通(簡稱傳通)¹概念：「氣」。相由心生，魏王曹操刻意扮演的「形陋」和「位卑」的角色，未能掩蓋他的英雄氣概，而他外在的英雄氣概也未能掩蓋他內在的小人氣度與人格特質。這現象在東方文化的情境中，用「氣」來解釋很簡便。在西方則很難解釋「氣」，更不必說用氣來解釋這則故事所顯露的現象。為說明西方傳通理論的缺陷，本文試以西方的傳通理論來對照正在萌芽的「氣的傳通理論」，互相對話，經由這兩種語境的對話，來探照一種新語境的傳通理論。

西方的傳通理論發展得很早，但直到二十世紀後葉，傳通理論幾乎都是在北美洲發展出來的。以小約翰(Stephen Littlejohn)的名著《人類傳通理論》(*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為鑑，1983年出的第一版，所介紹的理論都是美國和加拿大學者創作的，六年後第三版，才增加歐洲和巴西的傳通理論。到二十一世紀，還沒有歐美以外發展的傳通理論得到普遍接受。全球化與時俱進，學術交流益發通暢，學術理論固不宜論地域，但從多元化的角度來說，獨特的文化產生獨特的理論以貢獻傳通的學術研究，應是合理的期待。傳通學界，包括東方學界，都奉西方的傳通理論為圭臬，東方有無必要發展特有的傳通理論，仍在爭論。東方傳通理論的發展，也一直未成氣候。東方有沒有獨特的文化成分可研究發展出獨特的傳通理論？有的，「氣」就是。

氣的觀念，源於古老而深厚的哲學，也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層面，在中、日、韓、越、港、澳和台灣等地，「氣」字無所不在。氣學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有非常豐富的涵義，具備理論建構的基礎，在這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氣傳通理論，將可用來描述、解釋、或預測人際現象或傳通的行為。

以「氣」為本的傳通理論在1990年代萌芽。西元2000年以後，已見幼苗滋長，理論基礎初奠，並據以分析新聞傳播(鍾振昇，2004)、組

織傳通(Chung, 2008; Chung & Busby, 2002)、公司傳播(Chung, 2003, 2011)、社會傳播(Ito, 2002)、²政治傳播(Isaacson & Chung, 2004)、以及人際溝通(Hara, 2006)。除了美國、加拿大及台灣等地的學術書刊登載傳通之氣的文章外，日本期刊也刊出討論中、日、韓、美、台等地氣的傳通的研究現況及遠景(Chung, Hara, Yang & Ryu, 2003)。此外，Chung和Ho(2009)及Chung(2011)以氣論為本，提出公共關係的新模式。而Chang、Chen、Chung和Holt(2010)等也從文化間傳通的角度，比較氣和領袖魅力兩概念。

建立傳通的氣理論雖有厚望，但仍有重重困難亟待克服，治學不易。東方人對氣的各種意義，視為理所當然，但卻不知其所以然。東方國家西化日深，教育上東方哲學的影響力日衰，西方科學的思維日盛，現代的東方人也逐漸和西方人一樣，對氣「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很難介紹或解釋，所以有必要和西方理論做比較，以促進了解。建立氣的傳通理論，定義須要先行，而氣理論和西方理論的比較，則是一項搭橋的工程。本研究因此先探討氣和傳通的定義，並融合二者，提出傳通之氣的假定，再據此建立氣的傳通理論。然後再以氣的傳通理論比較西方較接近氣學的傳通理論，包括系統理論、共振理論及關係辯證理論，整理出東西理論的異同之處，並據以引申氣的傳通理論。

氣的定義

氣的概念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有如一條大江東流，浩浩蕩蕩，不只廣納百川，也分支分流；不只流入儒、釋、道各家領域，也灌溉了哲學、文學和藝術，更衍生了風水(陳國明, 2004)、卜卦、武術、醫藥等等民生技術。而儒、釋、道各家也為氣的學問注入豐富的內涵。所以氣的概念變得成分複雜，為氣下定義頗費工夫。

氣在中國的原始意義是雲氣，是物理的自然之氣。氣後來和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觀念合流，實用於曆書、農業和中醫學等，又逐漸被引申為哲學的天地元氣，具有凝聚、醞釀、擴散、流動等功能(張靜二, 1994)。氣和陰陽的觀念早在儒、道分家之前就有。《周

易》(《易經》)的陰陽、八卦和循環觀，對氣有明顯的影響。《國語》(《周語》卷一)就記載以陰陽之氣解釋自然界現象(地震)的說法(劉長林，1993)。

儒、道兩家因人生觀不同，對氣的解釋也各異。道家重自然，以天地之道、氣和陰陽來解釋宇宙和生命，以老子和莊子為主。儒家重政治和家庭，認為天地和人的氣都有正邪，具仁義道德的色彩，以孟子的養「浩然之氣」最具代表性。佛家傳入中國時，氣和陰陽、五行觀念已在中國有千年歷史，漢唐早期中譯佛經中沒有氣這個觀念，晚唐和宋初佛教接納儒家和道教而產生禪宗這個中國化的佛教支派，少林禪寺以氣功聞名於世(木村清孝，2004)。宋明理學家把氣的地位提升到與「道」、「理」同級，氣被引申為宇宙的根源和本體，有所謂道德氣本論和自然氣本論之爭(Liu, 2008；劉又銘，2005)。儒、釋、道三家雖然人生方向各異，但在養生上有一個共同的修持，那就是相信意志可以帶動身體之氣的流動，利用調氣來調整身心，可使人達到成神(佛)、仙(道)和聖(儒)的境界。這已是接近心理學和傳通學的領域了。

宋朝道士把氣、陰陽和五行觀念圖像化，畫了太極圖。周敦頤據此綜合儒、釋、道三家，替這個太極圖寫了「太極圖說」如下：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這段話顯示，氣的概念，極可能受到大自然節氣變化和星球運行的啟發而來。周敦頤接着又逆向解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周敦頤，1978)。這個太極圖歷經改良，而成為目前常見的雙魚圖。後人又將雙魚圖和八卦圖合繪，表現太極圖和八卦的關係(圖一)。八卦以三個不同陰陽爻組合成八個卦，表現出多層次的陰陽和其變化。太極圖則以相對稱的黑白雙魚表現陰陽相對、互動和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的循環。這一套圖文說明陰陽生氣的最基本原理：陰陽對稱、對等、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互相依存、互為一體。陰陽循環互動而滋生節氣和大自然的生氣。而社會人文之氣也就依循這個道理來解釋。

圖一：八卦太極圖



清朝以來學者對西方的哲學和科學接觸日多，也試圖用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質、能、力和資訊的觀念去解釋氣。張靜二(1994)列出近代學者對氣的定義，其中多以「質」為中心。例如，馮友蘭(1967，引自張靜二，1994)認為氣是希臘哲學中所說的材質(matter)；錢穆(1971)說氣是指宇宙萬物的實質部分；唐君毅(1973)說氣是「流行的存在，或存在的流行」；勞思光(1980，引自張靜二，1994)說氣是「時空中之存在所具有之資料」；徐復觀(1974)以氣為生命力或「生理的綜合作用」。張靜二(1994)則從文氣的立場，把氣解釋為「生命力」。他以字源學的方法，主張生命力是一股不可遏抑的維生力與創生力，而力是驅動對象的能量；生命力就是驅動生命的能量或動力(頁10)。

以上學者對氣的解釋，表面看起來很亂，很矛盾，氣怎麼可以同時是材質、能、流行、資料和生命力呢？若更深層地了解氣學的歷史，就可以了解，東方人的氣的觀念已廣泛到涵蓋宇宙所有有形和無形現象和功能的解釋，材質、能、流行、資料和生命力都能代表氣的部分意義，另類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各取所需，各自定義。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歷經場論(field theory)、相對論(relativity theory)、量子論(quantum theory)和最新的弦論(string theory)，使用精進的研究工具，已打破原子論的質和能，以及結構和功能截然劃分的觀念。弦論主張整個宇宙最小的分子是震動的圈(loop)，稱之為「弦」，整個宇宙就像一個交響樂團，從最小的分子到最大的星系，都是質能不分

的「弦」共振所產生的現象(Greene, 2003)。如果弦論的共振可以解釋宇宙所有的現象和功能，則用氣來解釋宇宙所有現象和功能也就不矛盾。傳通解釋的是人際關係的現象和功能，用氣和共振來解釋也就容易瞭解。

傳通的共振理論將於本文後節討論，在此先用「能」的產生過程來和氣的形成相比較。西方人把「氣」翻譯成能的流動(energy flow)，讓人望文生義。雖然「能」這個概念，連十九世紀中葉的牛頓都還不知道，但是現在已成為科學上最熟悉的觀念之一。偏偏「能」(energy)是最難下定義的概念之一(Hewitt, 1987)。

要了解甚麼是「能」，必須先知道「力」(force)和「功」(work)這兩個概念。力是會造成改變的東西，功就是量改變了多少，能就是功成(work done)。物理學上，能可以轉化(transform)，但質能的量是不變的。當一個系統的能轉化成力，對另一系統做功，功成時另一個系統的能相對增加，原來系統的能相對減少。能分成兩大類：動能(kinetic energy)和位能(potential energy，或稱潛能)。動能是移動的能(energy in motion)。位能是「位置的能」(energy of position)，因位差而產生的潛能。用氣的觀點來看，這位差就是相對等的「陰」與「陽」。

氣到底是質、能、能的流動(energy flow)，還是力(force)呢？從以上「能」的定義來看，能是「可以做功」和「已經做功」的潛能，或是正在做功的動能。力是能轉化時產生改變的力量。能是潛在的，力是外顯的。從傳通的立場來看，可以影響(或被影響)的是能，正在發揮影響的是力。感覺到的(perceived)或可以被感覺到的是能。照東方人的「養氣」觀，氣是可以養，所以是潛在的能，養氣之後形成人格氣質，則是質。氣也可以發揮的，把氣發揮在經世濟民或著書立說，那麼「氣」就有「力」了。東方人所說的氣，應該是包括質、能和力。氣一則是潛能，另一則是正在發揮(做功)、流動的能。

研究「氣」須談「勢」才有意義。勢的觀念比氣更年輕，約2,250歲。最早提到勢的是慎到，他用幾個比喻來說明勢的觀念。例如，牛是龐然大物，難以推拉。但是，牛鼻中有軟骨鼻環，栓一根繩子在鼻環上，連五歲的小孩都可以牽着牛跑。這樣掌握關鍵點，就是掌握勢。

慎到的另一個比喻是，谷底有幾十丈高的樹，懸崖上有一吋高的樹，因為佔了高處的優勢，寸木比幾丈高的樹還高。慎到也用工具（如車、馬）等比喻優勢。所以二十世紀的美國人Ames (1994)就把勢(*shih*)定義成策略性的便利(*strategic advantage*)，符合勢「因利乘便」的含義。法國社會學家余蓮(François Jullien)在討論勢的專書中則譯成*propension*和*propensity* (Jullien, 1995)。

物理學界中文不把*potential energy*直接譯成「潛能」，卻把它譯成「位能」，應該是取其*energy of position*的意義。當兩個以上的事物處於不同的位置(*position*)，有了位差，就有位置價值(*positional value*)，結構就產生。不同的結構，具有不同的潛能，可以做不同的功。「位置」和東方的「勢」觀念非常接近。因為位差，造成物體(事件)的運動，轉換成動能，例如水往低處流，氣從高壓往低壓區移動等。「位置」的不同，決定能的運動形式、方向、速度和產生的力量的大小。用東方人的觀念來說，勢決定氣的運動形式、方向、速度和所生力量的大小。例如，社會上居高位者和居低位者有位差，傳通時氣向下流動，更有威力。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把氣翻譯成*energy flow*，只強調氣的流動性和功能性(動能)，而忽略了氣的結構性(位能)。勢的觀念，正好補此不足，因為勢主要是強調結構。東方人氣勢合用，而且把萬事萬物結構和功能的不同，用相對的陰和陽兩字來概括。氣、勢和陰陽的關係很密切。陰陽是氣的屬性，勢則是陰陽之氣所形成的結構，透過調節陰陽的差距，則可改變勢，進而影響氣的生成、轉換和強度(*intensity*)。

綜上所述，氣是「能」或生命力(*vital energy*)，以靜態儲存，以動態顯現。從傳通的角度來看，能動心(感覺到)的或能對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力的訊息，不論是語文(*verbal*)或非語文(*nonverbal*)都顯示氣。氣可定義為一切事物陰陽互相作用而顯現的生命力。氣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存在於事物中的生命力，藉由陰陽互動而顯現出來。³

氣的傳通理論

傳通理論的演進，基本上尾隨西方的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單向傳播的行動途徑(action approach)是從電話通訊的原理發展而來的，後來演進到雙向溝通的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l)。這些傳統的傳通理論強調信息的運輸。1950年代起，資訊革命開始，系統理論也廣為流行，傳播的模式也跟着改變，Dean Barnlund (1962)把系統理論用到傳通研究，提出意義分享(meaning sharing)的觀念，把物理學的場(field)和相對論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都用在傳通理論上，建立了傳通的環動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東方的氣學和西方的傳通理論，兩者的發展雖然少有交叉，但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就是都經過對物理現象的解釋階段，推展到生物學、生理醫學、再運用於心理學、社會學，乃至傳通研究。本文後段討論的傳通系統理論和共振理論都是源於自然科學，逐漸沿着以上的方向而走向傳播理論。

到廿一世紀，傳通學者把氣、勢和陰陽的觀念引進傳通理論中，試圖建立氣傳通理論。鍾振昇(2004)用陰陽造勢生氣，引用文氣學者介紹的修辭策略(第環寧，2002；朱榮智，1998)，提出初步的傳通之氣理論和傳通策略。

鍾振昇指出，第、朱等人所提的鍊字、鍛句和謀篇等方法，都是利用陰陽對立來構勢，以產生文氣。以鍊字為例，用虛字(如「兮」字)來襯托實字(一般內容字，即 content words)。虛字是陰，實字是陽。如「力拔山兮氣蓋世」中的兮字若抽掉，氣將大失。遣詞方面，用舊詞(陰)與新語(陽)相對稱，如把文言和白話夾雜，可以用新詞(陽)對照舊詞(陰)來顯出活力。鍛句方面，變化結構，例如把「朝氣蓬勃」改成「朝氣最是蓬勃」，甚至倒裝成「蓬勃最是朝氣」。謀篇方面，鍾振昇(2004)引述了朱榮智書中的五個方法，分析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兩篇社論。這五種方法是抑揚法、正反法、詳略疏密法、賓主法和虛實法等，都是陰陽相對。該文也提到修辭學上的音節變化(聲韻)、誇張和對比(antithesis)等，都是利用新舊、大小、正反等的陰陽對稱之勢來壯氣。

Chung 和 Busby (2002) 在分析組織溝通中的命名(naming)策略時，提出勢的分類，即順勢(suck shih)、避勢(duck shih)、逆勢(buck shih)和造勢(construct shih)。這些勢中，有明顯的陰陽形勢在內。像順勢是小勢(陰)借大勢(陽)；避勢是小勢(陰)避開大勢(陽)；逆勢是小勢(陰)搏鬥大勢(陽)；造勢則是從無勢狀態(陰)製造成有勢狀態(陽)。「陰陽構勢以生氣」這個模式，不只用於分析大眾傳播的內容。Isaacson 和 Chung (2004) 也用這個模式析布殊和戈爾在總統競選時，如何使用競選傳通策略解決弗羅里達州的計票僵局。其中，職位、潮流、時尚和社會價值等都是有力的勢。

氣的傳通研究屬於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關注的是傳通之氣的運作，也就是傳通之氣如何產生、運動及聚散。本文擷取易經陰陽循環互動的原則，並引申《老子》一書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余培林，2004，頁89)作為本文傳播之氣理論的主幹。因為這一段話言簡意賅，深入分析卻能含括氣和宇宙生成的關係，氣和陰陽的關係，氣和人類事物及行為的關係，以及氣和傳通整體的關係，和現代自然和社會科學也最接近。儒釋兩家的氣論，比較偏重在行為的層次，有益氣的傳通研究，對本文的理論建構不如道家的貼切。

把氣論的觀念運用在傳通理論中，或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裏，氣的傳通就是陰陽構勢沖氣，以情緒的層面影響訊息的強度和傳通效能的過程。以下簡述氣論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假定，在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提煉出更具體的假設(hypothesis)，來做實證性的觀察與測試。每一原則後面緊接着從傳通的角度提出氣的傳通理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原則一：萬物負陰而抱陽

物有陰陽的觀念源自易經。一切事、物、現象、或行為都含有相對的屬性，例如，溫度的高低，事物的長短，士氣的消沉昂揚，策略的得失等，以陰陽代表之。

所有傳通要素，如傳通者、訊息、媒介、情境及意義等，都是「萬

物」之一，他們本身都有陰陽之氣。例如在大眾傳播方面，消息的新舊、採訪報導對象年紀的大小、媒介的「冷熱」等都是。又如小組和組織溝通中的風氣的厚薄、氣候的支持性或防禦性(Gibb, 1961)、⁴組織文化中的人情的冷暖、管理階層作風的軟硬等，以及各種傳通信息的侵略性或姑息性等，都是傳通要素內所含之氣的陰陽屬性。傳通要素之氣互相作用後產生之新氣，如意義等，也是萬物之一，所以也有陰陽不同的屬性(詳見下面假定六的說明)。至此，可以推出傳通之氣的第一項假定。

假定一：傳通之氣存在於各傳通要素中，各要素都具有陰陽屬性。

原則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氣是整體的現象，往往以全人格(whole personality)顯現。整體是由具有陰陽不同屬性的成分(parts)組織而成。以傳通者為例，傳通者顯性的陰質人格中有隱性的陽質成分，顯性的陽質人格中也有隱性的陰質成分。例如，個性強(陽)的人，也可能有意志力薄弱(陰)的一面；不論再樂觀(陽)的人，也有悲觀(陰)的一面。「時窮節乃見」和「日久見人心」，隨着時間或情緒的變化，可能顯露陰性或陽性的氣質。由上所述，可以推出傳通之氣的第二項假定。

假定二：傳通之氣中，陰氣中含有隱性的陽因子，陽氣中含有隱性的陰因子。

原則三：陰陽相對構成「勢」

陰陽相對構成位差，類似於物理學上的位能，能夠生力而做功。這位差就成勢。陰陽是氣的屬性，勢則是陰陽之氣所形成的結構，透過調節陰陽，可改變勢，進而影響氣的生成和轉換。

例如，傳通者有人格特質(例如專橫或溫順)、知識(豐富或淺薄)、身份地位(高或低)等的不同，他們的氣也相對有陰陽之差，構成

傳通之「勢」。如地位高的人說話可能理直氣壯（順勢）。地位低的人可能據理力爭而顯現勇氣（逆勢）。審時度勢，可以發揮影響力，達成傳播的效果。在組織溝通的情境中，陰陽之對稱最明顯，例如，員工和老闆，下屬和上司，人際關係(relation)和業務(tasks)，組織和環境，法條和創意等等。所以這些陰陽之氣要協調(沖氣)，傳通就有必要了。勢(例如社會地位)改變，氣的流轉方向可能隨着改變(例如，口氣由「下對上」變為「上對下」)。由上所述，可以推出傳通之氣的第三項假定。

假定三：改變傳通之氣的陰陽勢差，可改變傳通之氣的流轉方向、變化速度、和影響大小。

原則四：氣可造勢

陰陽造勢固然可生氣，氣也可以造勢。例如，報紙固然可利用勞(陰)資(陽)對立造勢，進而鼓動風潮，引起勞工激昂慷慨的氣，這氣也可凝聚成一股浩浩翰翰，莫之能御的民意勢力。

假定四：氣和勢可以互為因果。

原則五：陰極陽生，陽極陰生

《老子》第二十五章說：「逝曰遠，遠曰返。」就是現代人所說的物極必反。(余培林，2004)。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主要是說明「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的道理。陰和陽雖然能相輔相成，達到穩定的狀態，但是這個狀態只是暫時的，終究會消長、輪替，所以陰陽循環是一大勢，氣也因此會變易消長。物理及社會的世界是迴轉的模式，任何力量都蘊藏其對立的種子。某一種情況臻於極端，則必轉變成其對立的情況。

從傳通的角度來說，「陰極陽生，陽極陰生」就是循環。傳播要素間的相對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們的陰陽之勢會消長，氣也會變

易。例如，一個國家社會可能久戰兵疲，由意志昂揚到頹廢喪志；一個組織的領導人(傳通者)作風強勢，頤指氣使，部屬(另一端的溝通者)因而畏縮不前，造成組織氣氛陰暗消沉。但壓抑過久，部屬可能反抗，進而爆發激烈爭執，組織的氣氛轉為陽剛暴烈。例如，聯合航空公司的勞資對立演變到由員工接收，擁有公司，陰氣轉陽。員工主導經營走下坡，則陽氣轉陰。由上所述，可以推出傳通之氣的第五項假定。

假定五：傳通之氣「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發展至極致，則會陰陽互轉，造成循環。

原則六：氣能代代相生

氣有世代(generations)。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名言中，一是指一氣、二是指陰陽二氣，三是指陰、陽、和三氣。一氣化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相激相盪而產生和氣，如此不斷的交和，不斷的創生，於是產生萬物(余培林，2004)。第一代的陰陽之氣相沖的結果，產生第二代的氣。第二代的氣相沖的結果，產生第三代的氣，不斷地流轉變化(transform)。

嫻熟東方文化的班瀾(Dean Barnlund)所提倡的環動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也強調傳通是不能重複、不能收回的。意義分享後，新的意義即產生，再也不能回到原來的意義(Barnlund, 1970)，這就是第二代的意義，類似氣有世代的模式。貧富由仇恨之氣轉成的祥和之氣，或是第五項假設中由陰沉轉成的暴烈的組織氣氛，都是第二代的氣。準此可推出傳通之氣的第六項假定。

假定六：傳通要素的陰陽之氣相沖而生新世代的氣，且能代代衍生。

原則七：「氣聚成形，形散成氣」

氣化可以成物，氣可以積聚而成形(萬事萬物)，形也可以分散而成氣，能做功和發揮影響力。莊子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之為

生，散之為死」。他又舉例說：「臭腐復化為神氣，神氣復為臭腐」〈知北遊〉。聚和散就是氣轉化的過程。就形式(form)和過程來說，氣聚成形就造成結構或組織，形散成氣就是發揮作用。

從傳通來看，氣化可以成事，也可以成現象。傳通的氣(例如文章的文氣和說話的口氣)，可以藉着傳通來吸收、轉化和儲存而「聚氣成形」，形成傳通者的人格或訊息的風格。形也能散成氣，也就是把修養和人格發揮出來，轉化成訊息的風格或文氣，對外傳播，引起感受或造成影響。例如，讀書人(尤其儒家)「養氣」用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參宿學宏儒、遊名山大川等來累積知識、經驗和眼光，聚「天地人之氣」而育成「浩然之氣」，經發揮和轉化，在他們的文章上形成「文氣」，透過文字而流傳千古。準此，可推出傳通之氣的第七項假定。

假定七：傳通之氣能被吸收、轉化、儲存和散發，以結構成形，以散發造成影響力。

原則八：「沖氣以為和」

陰氣和陽氣能相沖，也就是能互相作用(interplay)。「沖氣以為和」的「沖」字歷代解釋不同，一般傾向有兩個解釋，一是虛(沒有把的杯子)的假借字，意思為虛，有「空」和「無」之意(余培林，2004)。另外，《說文》把沖作「涌搖」，引申有激盪之義(余培林，2004)。虛和涌搖這兩個意義似乎矛盾的，如果從過程來談則不矛盾。一方騰空，才能接納另一方的充實。陰氣和陽氣相沖，類似能的轉換(transformation)過程或能的交換。沖的作用可能在組織分子彼此之間發生，也可能是外力施加的，不論何者，都可轉化成做功的力量，這種做功的力量，就是生命力。陰陽之氣相沖有兩種結果，一是激盪過分而趨向不穩定，有如颱風或颶風，不只造成事物本身的解體，甚至對周遭事物造成殺傷力。另一為趨向穩定，也就是「和」的狀態，形成新的事物。

描述傳通的過程，須包含傳播要素間的陰陽之氣相沖的過程才完整。傳通過程是傳通要素的氣「互相作用、影響、適應、或協調」的過程。例如，A國因足球賽和鄰國起紛爭，鬧到要以兵戎相見。A國兩個

政黨中，甲黨力主攻擊鄰國，戰鬥氣氛(陽氣)十足，透過媒體以一連串的論述(訊息)煽起民眾的主戰氣氛(陽氣)。乙黨主張政治不要介入體育顯露陰氣，初居劣勢，但以「戰勝的收益遠低於巨額的軍火費用」為論點，透過媒體提出文氣十足的反駁，終於在民氣中扭轉劣勢，與甲黨平分秋色。整體民氣由亢奮之主戰及反戰兩極氣氛，轉化為和緩的中道氣氛，贊成尋求戰爭以外的第三方案，媒體也順着民意，開始反戰。這個簡化的假設性傳通過程顯示，傳通者(兩黨)的氣，可能影響社會之氣(民氣)，反之亦然。而影響過程中，訊息的氣由「戰勝收益」與「軍火費用」差距促成，又可能是關鍵作用。至於媒介冷熱之氣(麥克魯漢語)所造成的影響，未在本例討論，但也是另一個媒介可能影響訊息的因素。

傳通研究的傳通之氣研究的重點在氣，主要目標可設立在研究各傳播要素的陰陽之氣，以及如何調整陰陽之氣，以沖出理想的氣，達到傳通的效果。

由上所述，可以推出本文最後一項假定。

假定八：傳通是陰陽之氣在傳通要素之間聚散、流轉、互動、沖激、變化、和融合成新氣的過程。

本節分析氣的八個基本原則，並引申為傳通的八個基本假定，作為傳通之氣的理論基礎。傳通之氣理論就是研究傳通要素的陰陽之氣如何積聚，如何發揮，以及如何相沖以轉化成新氣，達到傳通效果的過程。據此可推出「調節陰陽差距，締造陽剛或陰柔之氣」的原則(見 Chung, 2003 & 2011)，並在應用層面演繹出借勢、抗勢、避勢和造勢的氣傳通策略。為了更了解氣與傳通之間的關係，下節把傳通之氣理論和西方的幾個重要的傳通思維或理論做比較。

氣的傳通理論和西方傳通理論的比較

有些西方傳通理論有氣論的影子。以下顛列三項和氣的觀念相類似的西方傳通思維(系統、共振、關係辯證等理論)，將有助於了解氣

論發展成傳通理論的潛能。本文所指的氣的傳通理論是基於過去十年內所出現的相關文獻，以及上述八大氣學原則所引申的八大傳通假定。

系統理論的架勢

伯特蘭菲(L. Von Bertalanffy)在1932年就主張有機體(organism)是開放性系統。他在1950年的《科學》期刊又發表了一篇歷史性的論文〈物理和生物的開放性系統理論〉。1968年再出版《一般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一書。各學術領域於是如斯響應，援引運用，系統理論於是風行於物理、生物、心理、管理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傳通研究。

系統理論的主要觀念在於組織，一個系統是由分子(parts)組織成的，每個分子之內又有次分子(subparts)，各分子是獨立而互賴的，他們可能共有某些次分子。系統外有環境，系統若獨立又開放，和環境相通，形成大系統suprasystem。系統如此層層相扣。

卡茲和卡恩(Katz & Kahn, 1972)把開放性系統的共同特色導入組織研究上。他們從社會組織的情境來說明這些特色，其中至少有七項和氣的觀念相類似。

社會組織第一要輸入能，例如人員、觀念、和物料；其次要轉化能，成為產品或服務。第三要輸出能(如產品和服務等)到外界環境。第四，系統是活動(event)的循環，如輸出的產品或服務換成金錢，輪回組織，用以聘用人員和採購物料；這個循環就形成組織的結構。第五，反敗亡(negative entropy)；Entropy是熱力學的熵，熵會造成生物的敗亡，而敗亡的過程是宇宙的自然法則，所以任何組織都會走向解體或死亡；開放性系統為了延續生存，都必須輸入比生存所需更多的能來反敗亡。第六，動力求穩(dynamic homeostasis)。輸入能源來控制敗亡，才可求得穩定，存活下來。但是，穩定狀態並不是不動，而是輸入和輸出保持一定的比率。第七，殊途同歸(equalfinality)。開放系統起先的情況並不一致，途徑也不同，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卻都可能達到同樣的狀態。

班瀾(Barnlund, 1962)利用以上源自系統理論的這些假定，建立了傳通的環動模式。在他的論文〈走向以意義為中心的傳播哲學〉“Toward

the meaning-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中，用意義分享(meaning sharing)取代直線式資訊運送的觀念，主張傳通是全人格(whole personality)的參與；傳通不是一個實體(entity)，而是一個過程(process)；傳通研究的重點應放在受訊者，而非傳訊者。班瀾(Barnlund, 1970)後來進一步在他的論文〈環動模式〉(The Transactional Model)中，把傳通定義為「意義轉變的過程」(the process of evolving meanings)。他也在文中提出傳通的假定(postulates)，其中有幾項和氣相近。他說，傳通(1)解釋意義的轉變；(2)是動態的；(3)是連續的；(4)是循環的；(5)不能重複；(6)不能退轉；(7)是複雜的。他去除了傳統着重的傳通要素的傳通理論，而用「暗號」(cue)去解釋傳通的過程。班瀾的暗號(cues)的觀念，可以用氣來取代，而對各種不同的訊號製碼和解碼以產生和轉換意義過程，就像沖氣。

傳通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進行，例如個人(自己對自己，intra-personal)、對偶(dyad)、小組(group)、組織和社會等情境。從傳通研究的角度來看，每個情境都是一個系統，是一個整體(whole)。系統中都有分子(parts)和次分子(subparts)。系統外也有環境。系統的成員都帶進不同的個性、知識、態度、社會經驗、生活技巧、或工作技術等等。

系統理論和氣的傳通理論的比較

系統理論的一些主要概念與氣理論中的主要概念相吻合。例如，系統理論中，分化(differentiation)的概念類似氣論學者羅欽順(1645-1541)的「一本萬殊」(萬殊之源於一本，見劉又銘，2000)。周敦頤的「陰陽一太極也」就是「殊途同歸」(equifinality)。

系統理論中的「系統對環境」，相當於氣學中的主體對客體。氣的作用必須有主體和客體。以主體而言，可以吸收氣(輸入)，使氣充實、累積(處理、儲存)，更可以發氣(輸出)。主體和客體之間互相吸氣、發氣和沖氣。主體和客體氣的關係可能是對峙或相向的情形，也可能是客體包含主體的情形(飛剛健，2002，頁26)。

圖二：氣的主體和客體關係⁵

如圖二所示，線性理論就是對峙或相向的關係，系統理論就是客體包含主體的關係。當主體成為組織的一分子時，所擁有或發出的氣，就是系統內關係中第一代的氣。藉着溝通，不同成員的氣互沖，轉化(transform)成新的氣，又回饋到系統中，產生關係中成為第二代的氣，如士氣、氣氛、氣焰等系統的氣。這第二代的氣，可能是陰性的和煦之氣，也可能是陽性的昂揚之氣。不論那一種，都會回饋到關係系統中，影響關係(例如猜疑或信任，沮喪或興奮等的氣)。也可能影響溝通的方法(例如遣辭用字等)。系統也會從環境中輸入外來物(exogenous material)，如新人員或觀念，建立新的關係(relationship)，這新的關係又回饋到環境中，產生第三代的氣(陰或陽)。

氣的傳通理論可以涵蓋系統理論的一些觀念。例如，根據系統理論，一個組織要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群效(synergy)，不能只是一群人湊在一起(aggregate)，而應是一個整體。一個整體是組織的分子彼此有所連結，並互相作用。根據氣的傳通理論，「沖氣以為和」的原則，可用來研究在系統或組織內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組織之間找出或突出陰陽的不平等關係和相沖的先決條件，可以促進群效的產生、過程和影響。例如，一群人有了共同的目標，固然可以按照系統理論，以階層(hierarchy)組織起來，有領袖，有部屬，加強績效。但若運用氣的理論，則可以發掘陰陽對立的關係，以陰陽對立的信息鼓舞士氣。例如，藉由外來的威脅(內外陰陽之勢)或歷史的情結(例如壓迫與被壓迫之陰陽之勢)，強調「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激起同仇敵愾之氣。社會中，歷史興衰的循環律告訴我們，如果弱(陰)的一方臥薪嚐膽，不動聲色地壯氣，培養陽的種子，而強(陽)的一方驕奢淫逸，頹廢喪志，

播下陰的種子。終有一天位置對調，寇成王，王變寇，陰陽之氣也隨之迴轉。

其次，氣和關係系統(relation system)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以家庭系統為例，配偶之一方盛氣凌人，另一方低聲下氣，形成主從關係，不和也不穩。因此，關係必須經營，這就是前述的「動力求穩」。經營靠溝通，溝通靠沖氣。

另外，Katz和Kahn(1978)有關係系統的說明，有還原為唯物論的傾向，而忽略了人文主義的精神面向。一般傳通有作業(task)和社會情緒(socio-emotional)兩個層面。系統理論強調作業程序，而氣的傳通理論強調社會情緒的層面，可以彌補系統理論唯物傾向的不足。

系統理論和氣理論有上述差異，但從前述討論看來，也有共同處：都居知識系統的高層次，都具有後設理論(metatheory)的架勢，有啟發、包含及分析多項理論的潛能。

共振理論的呼應

老子的「沖氣以為和」的「沖」字自古以來有兩種幾乎相反的解釋。如前所述，一種指「虛」(void)，另一種指「沖激」。西方的共振理論，為這千古之爭提供了解決方案，因為共振的確會產生「虛」和「激盪」兩種不同的結果。

共振是物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原理，基本在於震動。當物體甲衝擊物體乙，會引起物體乙的震動(強加的震動)。強加的震動有其頻率，稱為強加頻率。但是，任何物體只要有彈性，受衝擊時自己也會震動，頻率獨特，稱為「自然頻率」。當強加頻率和自然頻率配合得當時，震動力量相加而激增，這個現象就是共振(resonance)。共振的主要原因在於震動產生諧波，波有「波峰」和「波谷」。當波峰疊波峰，波谷疊波谷，形成巨大的力量。用陰陽的道理來說，就是陽(峰)疊陽(峰)，陰(谷)疊陰(谷)，大起大落，造成激烈的氣(radical chi)，這時「沖」就可解釋成「沖激或激盪」。若波峰疊波谷，陰疊陽，則力量互相抵銷，這時「沖」就可以指「虛」。

共振理論應用在兩方面較受矚目。第一個是許沃茲(Tony Schwartz)把共振理論用到傳播上。他在《扣應心弦》(The Responsive Chord)一書中認為傳播理論中的運輸(transportation)模式(即單向傳通的行動模式)過時了(Schwartz, 1973)。傳播要有效,必須把一套刺激(stimuli package,指信息)設計到能夠和受播大眾腦中所儲存的資訊共振(resonate),才能夠收到受眾(audience)所期望的學習或行為效果。如何能共振呢?他說,信息的刺激,必須要受眾的經驗當中能感應的,才有反應。有反應才能產生意義。

許沃茲說,從信息發出者的角度來說,要想牽引出(evoke)受眾儲存的資訊,必須了解聽眾所儲存的資訊是哪一種,有何類型(pattern),以及互動共振的過程又如何。許沃茲強調,聽眾或觀眾的腦子是整個傳播過程中不可缺的要件。傳播的意義,由以下三者互動而決定:受播者的經驗、受播者對刺激物的期待、以及傳播的訊息。傳播者的挑戰,不是讓刺激物運輸過去,也不是讓他的刺激物包裝得更易懂或吸收,而是他必須深刻了解觀眾腦子裏裝的是甚麼資訊和經驗、資訊的形式,以及可以喚起這些儲存中的資訊的互動共振過程。

許沃茲說,「傳播的訊息」與「受播者的經驗」互動的結果,產生他所謂的「感覺上的共振」(perceptual resonance),使受眾搭調(attune),而能以一定的方式收受一定的信息。他稱這種「互動模式」為共振理論。而稱舊的行動模式為線型的「運輸理論」(transportation theory)。許沃茲指出,傳播的效果,關鍵在於共振(Schwartz, 1973)。

共振理論的第二種運用是把物理學上的共振理論用來解釋生物體的循環和人體的氣。王唯工(2003)利用物理學的實驗,把中醫的經絡和氣做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氣事實上是一種『共振』,也就是人體血液循環的動力」(頁28、52)。他主張用共振理論取代現代西方醫學血液循環的「流量理論」。流量理論認為人體血液循環靠心臟跳動壓縮,產生動能,推動血液循環。王唯工的「共振理論」則認為人體的五臟六腑都像樂器一樣,有着空腔和硬管。藉着空腔和硬管接連血管,人的五臟六腑變成掛在經絡和血管上的共振體。當主昇動脈把血液打出心臟時,轉了一個大彎,把動能轉化成動脈血管上共振的壓力位能,這位能就是氣。藉着臟腑的共振而推動血液循環全身各器官,這就是「氣行血」。

何美惠(2005)認為，王唯工動能轉換壓力位能而「氣行血」的理論，讓陰陽和氣的關係更清楚，因為按照王唯工的理論，諧波頻率的高低造成位差，產生位能，進而共振，強化諧波的功能。氣就是諧波，高低頻的諧波，就是陰陽之氣。共振是沖氣的一種方法，就是老子的「沖氣以為和」裏的「沖」。

共振理論和傳通之氣理論的比較

氣理論中，有共振的影子，中國明朝氣學者羅欽順說：「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夫感應者氣也」(黃宗義，1985)。氣理論已有互動的觀念。

研究傳通之氣，共振理論很值得重視，因為這理論是「陰陽沖氣」的極佳闡釋。不論那一種模式的傳通理論，都有陰陽兩種角色：發送訊息(陽)和接受訊息(陰)。如何產生有效的感應，則要揣摩研究如何調整，適時收發。陰陽造成位差，位差造成共振，共振造成傳通效果，氣的傳通理論的可結合這個邏輯，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和架構。從氣的傳通理論看共振理論，許沃茲雖然宣稱共振是傳通效果的關鍵，但他這理論只提供了一個粗略的傳通上的「供需架構」(依照受眾的需求而提供信息)，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如何創造需求，擴大需求。依照氣理論，需求是陰，供應是陽，增大陰陽差距(位差)，就能增強位能(氣)。例如，把共振理論用於前述以貧富不均煽動受眾，只是找出受眾對貧富不均的不滿，而以此為題，向受眾傳播。如果只是泛泛地說「富者富，窮者窮」，聽眾若為窮者，頻率或許調對了，效果卻可能平平。基於氣的傳通理論，傳通者須要擴大陰陽差距，找出(或想出)「朱門酒肉臭」(陽)和「路有凍死骨」(陰)兩個極端的例子相對稱，而造成強烈的對比(位差)，增大陰陽差距，激起強烈的感受(位能)，而採取行動。簡言之，依照傳通之氣理論的假定，不只要找出或建立「供需架構」，也要擴大這個架構。

王唯工和許沃茲的共振理論，運用的領域不同；王唯工把共振理論用於人體的循環系統，用以解釋中醫的「氣行血」理論；許沃茲把共

振理論用於傳通研究，解釋共振影響或說服受播者的道理。但兩者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用位能取代動能，用共振的能取代流動的能。生理學的流程理論和傳通學的運輸理論都強調運輸的動能，也就是把血液或訊息從一方載到另一方。共振理論則含有陰陽的深層結構，強調雙方都放出頻波，兩個頻波以何種角度相交，決定共振的效應，有氣的功能，比傳統的西方醫學和傳通理論更進一步。

關係辯證理論的根藤

在各種傳通理論當中，與傳通之氣理論最接近的是關係辯證理論(theories of relational dialectics)。這個理論在1920年代就已陸續出現，到1996年芭蔻絲特和蒙歌瑪莉(Leslie Baxter and Barbara Montgomery)正式著書立說，出版《關聯：對話與辯證》(*Relating: Dialogues and Dialectics*)一書，才普受注意，成為人際溝通中的重要證理論之一。

芭蔻絲特和蒙歌瑪莉的這個理論大量吸取了蘇俄哲學家米卡意爾·巴克亭(Mikhail Bakhtin)的辯證理論：對話主義(dialogism)。巴克亭認為辯證的緊張(tension)是人類一切經驗的深層結構；一方面有一股集中的力量把兩人拉在一起，一方面又有一股分散的力量把人推開。芭、蒙兩人的理論，主要假定一，人際關係不是循直線向前發展的，而是沿着波狀起伏(oscillation)的曲線發展。例如，人的關係不是由疏遠發展到親密，而是時親時疏的。第二，關係生活(relational life)的特性是變化。第三，矛盾是關係生活的基本事實，緊張狀態不會消失；第四，傳通是安排和協調關係生活的中心(West & Turner, 2007)。

芭蔻絲特和蒙歌瑪莉認為關係生活中的辯證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分離性(separateness)對聯繫性(connectedness)；關係中的兩造，同時想要獨立自主，但又想要親密連結。第二是確定性(certainty)對不確定性(uncertainty)；既想要求穩定和掌握未來，又想要在關係生活中有新奇(novelty)。第三是開放性(openness)對關閉性(closeness)，也就是既希望向關係夥伴吐露心聲，又希望守口如瓶以保護自己。所以芭、蒙兩人的關係辯證理論，強調「社會自我」(social self)，而不是「最高自我」

(sovereign self)；多元的眾聲對立(multivocal oppositions)而不是單純的雙元矛盾(binary contradictions)。簡言之，就是以對話的途徑去研究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的辯證(Baxter & Montgomery, 1996)。

關係辯證理論與傳通之氣理論的比較

關係辯證理論的發展中，顯然注意到陰陽的關係。芭蔻絲特和蒙歌瑪莉的《關聯》一書中，就從本體論出發，引介老子的道的哲學，指出現實的要素在於對立的力量相互作用，產生動與變的過程，並以太極圖介紹「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的觀念。但是他們的理論中並沒有氣的觀念。關係辯正理論雖然和氣的傳通理論有「根相連而藤未纏」的關係，其與氣的傳通理論不同之處，至少有下列幾點。

第一，前述關係生活中的三種辯證都是兩種現象的對立，可納入陰陽的基本架構。但是，關係辯證理論的核心在矛盾，就是對立的兩個現象互相否定，造成緊張(tension)。處理矛盾的方法雖然也講整合，但以緊張的平衡為本。氣的傳通理論則以陰陽代表各種雙元(dual)的關係，基於「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基本原則，強調對稱和對等的，追求「陰陽和合」。

其次，在策略的層次上，巴、蒙兩人假定矛盾辯證對立或緊張的存在，介紹了一些處理矛盾的方法，例如「激烈爭辯」和「退避獨處」兩種方式交替運用，或把問題的各個層面區隔，雙方對有些層面取得共鳴，有些則避諱不談(Griffin, 2006, p. 170)。氣的傳通理論則在調整陰陽之氣的差距來構「勢」，擴大陰陽差距以壯激烈的「氣」，或縮短陰陽差距以求溫和之氣。審時度勢，營造各種氣氛(例如激烈或溫和)。也可基於陰陽二分的原則，施展順勢、避勢、逆勢和造勢的策略，處理人際溝通，達成「陰陽互補」和「陰陽一體」的效果。更積極，也更有建設性。

第三個關係辯證理論和氣的傳通理論的差異是，關係辯證理論強調兩人之間的關係及對話。氣的傳通理論雖然不是針對「對偶」間的關係而建立的，但由於氣有豐富的內涵，運用在兩人之間的關係，有更

多的途徑可循。例如，氣的培養，除了兩人之間的調和以外，個人本身的「養氣」也是一途。姚鼐以讀書養氣，曾國藩以練身養氣，孟子和朱熹以修德養氣，蘇轍以遊覽自然和人文景觀養氣（張靜二，1994）。這些都有助於提高西方人所說的信素(ethos)或信用(credibility)，比西方人際溝通研究中偏重使用技巧促成兩種矛盾「和平共存」要周密有效多了。

討論和結論

本文先討論東方氣和勢的觀念，並和物理的力與能的原理相對照，提出氣的定義和勢的作用，並就傳通的氣理論和西方的共振、系統、關係辯證等三個傳通理論相比較。用德國詮釋學家葛大漠(Hans-Gerog Gadamer)的語言來說，本文的闡釋就是西學與漢學「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之後的歷史效果(Gadamer, 2004, p. 304)。

從本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傳通的氣和傳通本身，有如下的關係：

第一是氣和傳通的關係。傳通者運用媒介、訊息、情境(context)，互相交換和建構訊息中的意義，以陰陽相對的原則，構勢運氣，藉着加強或減弱訊息的強度，促進傳通的效果。構勢是運用上的重點之一。

第二是氣與傳通研究。西方的傳通研究一般偏重在某一方面，有的重意義，有的重傳通人，有的重現象及過程。氣的傳通研究重點在氣，研究傳通過程中有潛能的生命力如何在傳通要素如發訊人(sender)、媒介、訊息(message)、受訊人(receiver)本身或各要素之間融合和轉換，如何產生影響力來達到傳通的效果。氣的傳通研究重視傳通過程所有傳通要素，所以氣傳通研究比較均衡。

第三是傳通之氣的性質。氣是動的(active)，動才顯得出活力(生命力)；氣是互動的(interactive)，陰陽互動是氣的孕育過程；氣是變動的(transformative)，互動後的氣和互動前的氣是不同的；是富有創造性的(creative)，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氣互動，即可創造新(第二代)的氣。有了氣的這些作用，傳通就更有效。

從氣的傳通理論和三種傳通理論的比較可知，氣的傳通理論至少有六項優點：一、有陰陽互補的觀念，對和諧關係或衝突解決能提供獨特的觀念或策略；二、有「社會情緒」的面向，彌補了西方傳統傳通研究的一大缺口；三、藉陰陽差距的調節，可用訊息的強度來培養激烈或溫和之氣；四、以人為主要的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不落入機械性或制度性框架(如系統理論)；五、有導自陰陽理論的實用策略(如順勢、逆勢、避勢和造勢)；以及六、有養氣的觀念，使傳通者(communicator)可自我加強本身在信用和信素的條件。

從理論建構的觀點來看，以上的理論重點都在討論結構(狀態)和功能(過程)。如表一所示，陰陽是氣的結構或狀態(state)，沖氣是功能或過程；以物理的能來說，位置是結構或狀態，做功是過程；共振理論中，需求與供應是結構或狀態，「扣」和「應」(共振)是過程；系統理論中，上司和部屬的關係，或組織與環境的關係都是結構或狀態，轉化是過程；關係辯證理論中，確定性對不確定性、親密對自主，開放對封閉等都是狀態，溝通是過程；從氣的傳通理論來看，氣聚成形是結構穩定(和)的狀態，形散成氣是功能轉換(沖氣)的過程。藉着沖氣，訊息的能在傳通的各造中作用，達到傳通的效果。

表一：氣和物理、傳通理論的結構和功能

理論	結構或狀態 (state)	功能或過程
氣	勢(陰和陽)	沖氣
能(物理)	位置	做功(work, 能源轉化)
共振(物理)	頻率高低	共振
共振(傳通)	需求與供應	「扣」和「應」(共振)
系統理論	位置價值(positional value) →穩定狀態	分享與互換
關係辯證理論	確定性/不確定性；親密/自主； 開放/封閉	傳通溝通
傳通之氣理論	氣聚成形：傳通者和訊息	形散成氣：發揮影響力，改變氣 氛、土氣

本研究為東西方影響傳通理論甚鉅而又接近氣論的理論穿針引線，尋求共通的陰陽造勢而生氣的原理。將來若以生理學和心理學出發，尤其關於情緒(emotion)在氣上的作用，觀點或將有新的境界。例

如傳通者養氣的功夫將扮演重要角色。將來若能以許曾米哈里(Csikszentmihalyi, 1995)的流動力理論(flow theory)比較莊子的氣化論(鄭世根, 1993; 王秋燕, 1995), 在氣的傳通理論的實際運作研究上當有東西互補之功。最後, 基於實證研究的原則, 為求理論建構的完整, 必須根據本文所提的假定(assumptions)導出下一個層次的假設(hypotheses), 這更是無限的研究機會和挑戰。

註釋

1. Communication 一字的中文翻譯各地不同, 在大眾傳播的情境中譯成「傳播」, 但在人際溝通的情境中則譯成「溝通」, 困擾極多。本文基本上援用慣例, 但在涵蓋兩者的情境中稱之為「傳播溝通」, 簡稱「傳通」。
2. 伊藤(Ito)的文章談論的「空氣」(kuuki), 是一種有強大壓力的社會或輿論氣氛, 也是本文所探討的的氣的一種。
3. 這兩句對氣的定義的補充說明極其重要, 因為氣可以顯現在事物、行為或現象中, 但不是它們本身。承姚德義先生引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一書指出, 實體與現象這兩個詞語是限界概念, 不可相互轉換或轉化。但是由本文討論可知, 氣非實體, 可以在不同階段呈現為感覺、行為、思想、甚至傳媒(如文字)等。
4. 吉卜(Gibb, 1961)把「傳通氣候」(communication climate)區分為支持性氣候與防禦性氣候, 符合氣的觀念, 也被引用了半個世紀, 至今不衰。但因為不符合理論構成要件, 在傳通理論界至今不成「氣候」。
5. 本圖由飛剛健(2002)的繪圖改進, 並加標示說明。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秋燕(1995)。《人體運動中「氣」的超越經驗與階層之研究——以莊子氣化論思想為主》。台灣師大碩士論文。
- Wang Qiuyan. (1995). *Renti yundong zhong "qi" de chaoyue jingyan yu jiecheng zhi yanjiu — yizhuangzi qihualun sixiang weizhu*. Taiwanshida shuoshi lunwen.
- 王唯工(2003)。《氣的樂章》。台北：大塊文化。
- Wang WK. (2003). *Qide yuezhang*. Taipei: Dagui wenhua.

- 木村清孝(2004)。〈中國佛教中的「氣」論〉。楊儒賓(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頁541-550)。台北：巨流。
- Mucun qingxiao. (2004). *Zhongguo Fojiao zhong de "qi" lun*. Yang Rubin (bian), *Zhongguo gudai sixiang zhong de qilun ji shentiguan* (pp. 541-550). Taipei: Juliu.
- 朱榮智(1998)。《文氣與文章創作關係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Chu Rongzhi. (1998). *Wenqi yu wenzhang chuanguo guanxi yanjiu*. Taipei: Shida shuyuan.
- 何美惠(2005年7月)。〈氣、共振、與傳播思維〉，「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AICS) 2005年研討會」論文，台北。
- Ho May. (2005, July). *Qi, gongzhen, yuchuanbosiwe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AICS) 2005 nian yantaohui" lunwen, Taipei.
- 余培林(2004)。《新譯老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 Yu Peilin. (2004). *Xinyi laozhi duben*. Taipei: Sanmin shuju.
- 周敦頤(1978)。《周子全書》。台北：商務。
- Zhou Dunyi. (1978). *Zhouzhi quanshu*. Taipei: Shangwu.
- 徐復觀(1974)。《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頁297。引自張靜二(1994)，《文氣論詮》。台北：五南。
- Xu Fuguan. (1973). *Zhongguo wenxue lunji*. Taipei: Taiwan xuesheng, p. 297. Yinzi Chang Ching-er (1994), *Wenqi lunquan*. Taipei: Wunan.
- 唐君毅(1973)。《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研究所，卷一，頁33。引自鄭世根(1994)《莊子氣化論》。台北：學生。
- Tang Junyi. (1973). *Zhongguo zhexue yuanlun, yuandaopian*. Xianggang: xinya yanjiusuo, juanyi, p. 33. Yinzi Jeong Se Geun (1994), *Zhuangzi qihualun*. Taipei: Xuesheng.
- 陳國明(2004)。〈易經八卦的人際關係發展模式〉。陳國明(編)，《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台北：五南。
- Chen Guoming. (2004). *Yijing bagua de renji guanxi fazhan moshi*. Chen Guoming (bian), *Zhonghua chuanbo lilun yu yuanze*. Taipei: Wunan.
- 張靜二(1994)。《文氣論詮》。台北：五南。
- Chang Ching-er. (1994). *Wenqi Lunquan*. Taipei: Wunan.
- 第懷寧(2002)。《氣勢論》。北京：民族出版社。
- Di Huaining. (2002). *Qishi lun*.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黃宗義(1985)。《明儒學案》卷四十七諸儒學案中一。台北：中華。

- Huang Zongxi. (1985). *Ming ru xuean juan sishiqi zhuru xuean zhongyi*. Taibei: Zhonghua.
- 飛剛健(2002)。《解讀氣的本質》。台北：林鬱文化。
- Fei Gangjian. (2002). *Jiedu qi de benzhi*. Taibei: linyu wenhua.
- 楊勇(2000)。《世說新語校箋》上冊修訂本。台北：正文。
- Yang Yong. (2000). *Shishuo xinyu xiaojian Shangce xiudingben*. Taibei: Zhengwen.
- 劉又銘(2000)。《理在氣中》。台北：五南。
- Liu Youming. (2000). *Li zai qizhong*. Taibei: Wunan.
- 劉又銘(2005)。〈宋明清氣本論研究的若干問題〉。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功夫論》。台北：台大。
- Liu Youming. (2005). *Songming qingqilun yanjiu de ruogan wenti*. Yang Rubin & Zhu Pingci (bian), *Ruxue qigong yu gongfulun*. Taibei: Taida.
- 劉長林(1993)。《中國智慧與系統思維》香港：商務印書館。
- Liu Changlin. (1993). *Zhongguo zhihui yu xitong siwei*.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 鄭世根(1993)。《莊子氣化論》台北：學生。
- Jeong Se Geun. (1993). *Zhuangzi qihualun*. Taibei: Xuesheng.
- 錢穆(1971)。《朱子學提綱》。台北：東大，頁36。引自張靜二(1994)，《文氣論詮》。台北：五南。
- Qianmu. (1971). *Zhuzixue tigang*. Taibei: dongda, p. 36. Yinzi Zhang Jinger (1994), *Wenqi lunquan*. Taibei: Wunan.
- 鍾振昇(2004)。〈氣的傳播理論和語文策略〉。陳國明(編)，《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台北：五南。
- Chung Jensen. (2004). *Qi de chuanbo lilun he yuwen celue*. Chen Guoming (bian), *Zhonghua chuanbo lilun yu yuanze*. Taibei: Wunan.

英文部分(English Section)

- Ames, Tim, R. (1994). *The Art of Rulership*.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arnlund, D. (1962). Toward a meaning-centered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4), 197-211.
- Barnlund, D. (1970). A transaction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n Sereno, K. & Mortensen, D. (Eds.),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83-102). NY: Harper & Row.
- Baxter, L. & Montgomery, B. (1996). *Relating: Dialogues and Dialectic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A Division of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1996.

- Bertalanffy, L. (1968). *General System Theory*. New York: Braziller.
- Chang, H., Chen, L., Chung, J., & Holt, R. (2010). In Search of a Western counterpart of chi: Eastern and Western cognitive frames in interpreting relevant chi terms. *China Media Research*, 6(1), 20–36.
- Chung, J. (2003, February).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H-P during the pre-combination stage of its merger with Compaq*.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est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in Salt Lake, UT.
- Chung, J. (2008). The Chi/Qi/Ki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energy flow with dialectics. *China Media Research*, 4(3), 92–100.
- Chung, J. & Ho, M. (2009). I-Ching, Chi (qi/ki) and Communication: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o the Extern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5(3).
- Chung, J. (2011). Chi-based strategies for public relation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 N. Bardhan & K. Weaver (Eds.), *Public relations in global cultural contexts: Multi-paradigma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 Chung, J. & Busby, R. (2002).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naming strategies: The ch'i-shih approa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I, 77–96.
- Chung, J., Hara, K., Yang, C., & Ryu, J. (2003). Contemporary ch'i/ki research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s to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Japan)*, 15, 41–66.
- Csikszentmihalyi, M. (1995).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Gadamer, H. G. (2004). *Truth & Method* (J. Weinsheimer & D. Marshall,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0)
- Gibb, J. (1961).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141–148.
- Greene, B. (2003). *The Elegant Universe*. New York: Norton.
- Griffin, E. (2006).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Hara, K. (2006). The concept of ki (spiritual energy) in Japanese Communication: An Element of Evoke Harmonie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Chinese-Japanese Science and Culture*, 6, 1–20.
- Hewitt, P. (1987). *Conceptual physics*. Menlo Park, CA: Addison-Wesley.
- Isaacson, F. & Chung, J. (2004). The Bush vs. Gore rhetoric after the 2000 election impasse: A ch'i-shih analysis. *SIMILE: Studies In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Vol. 4, 2(May), 1–12.
- Ito, Y. (2002). Climate of opinion, kuuki, and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6). Mahwah, NJ: LEA.
- Jullien, F. (1999). *The propensity of things: 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J. Lloyd Trans.). New York: Zone Books.

- Katz, D. & Kahn, R. (1972).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systems*. In F. Emery (Ed.), *Systems thinking*. Baltimore, MD: Penguin.
- Littlejohn, S. (2003).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Liu, Y. (2008). Naturalistic qi (chi)-based philosophy as a foundation of qi (ch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4(3), 83–91.
- Schwartz, T. (1973). *The responsive cord*. Garden City, NJ: Anchor Press.
- West, R. & Turner, L. H. (2007). *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本文引用格式

- 鍾振昇、何美惠(2012)。〈邁向氣的傳通理論：西學與漢學的對話〉。《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0期，頁151–182。